

BAINIAN XIAOPING

百年小平



（下卷）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BAINIAN XIAOPING

百年小平



百年小平

(下 卷)

钟 文 鹿海啸 编著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1975 年的整顿



1975 年,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。

1975 年,邓小平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狂风已经肆虐了近 10 个年头。当时,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非常混乱,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。面对这种状况,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,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,排除“四人帮”的干扰和破坏,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,大刀阔斧地对全党和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。

可以说,1975 年的整顿,是我们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。邓小平后来曾经说:拨乱反正在 1975 年就开始了,改革也在 1975 年试验过一段时间,那时的改革,用的名称是整顿。

1975 年的全面整顿,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。

1975 年 1 月 25 日,刚刚就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总参谋部的干部大会上作了《军队要整顿》的著名讲话,明确提出:军队要进行整顿。他说,目前军队的状况是:从 1959 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,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,军队被搞得相当乱,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,军队臃肿不堪,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。他强调,优良传统要恢复。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。“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、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,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。”由此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。

6 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,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,讨论军队整顿问题。7 月 14 日,邓小平在会上作了《军队整顿的任务》的讲话。他在讲话中指出: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,军队存在“肿、散、骄、奢、惰”等严重问题。军队整顿什么?就是上面讲的那五个字。他强调,军队要坚决反对派性,恢复优良传统。他说,有人讲,雷锋叔叔不在了,这很值得注意。军队要听党的指挥,不能散。

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受到全军上下的热烈拥护,会议精神经过短时间贯彻就取得了明显成效。其中的主要成果,一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迅速、果断地作了调整,二是落实了干部政策,有效地稳定和巩固了军队。



邓小平与许世友。

在进行军队整顿的同时,邓小平开始思考对各行各业全面的整顿。在此期间,毛泽东发出了三项批示: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。毛泽东的三项指示,虽然仍旧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,但也再次表明了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工作的支持。这三项指示,也成为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高举的旗帜。

把国民经济搞上去,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抓的首要工作。1975年2月10日,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伊始,便由中共中央发出《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》,要求全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,调动一切积极因素,把国民经济搞上去。

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,首先就要整顿国民经济。而要整顿国

民经济,按照当时的状况,工业、农业、商业、财贸、文教、科技等方面都是问题成堆,积重难返。下决心整顿,就不能只整顿一个部门、一个行业,而必须全面进行整顿。当时国民经济的状况是:1974 年上半年,不少地区和部门工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,钢铁、化肥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,特别是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的问题十分严重。由于生产下降,财政收支不平衡,收入减少,支出增加。1974 年工农业总产值仅比 1973 年增长 1.4%,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 0.3%,农业总产值增长 4.2%,钢和原煤总产量下降,国家出现财政赤字。不仅如此,江青一伙发起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,还造成了新的政治动乱,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了混乱的局面,一些企业的领导班子再一次陷入瘫痪,使得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形势又受到破坏。面对这样一个混乱加动乱的烂摊子,整顿从哪里入手呢?

在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,邓小平从来都是冷静分析,抓住要害,这一次也不例外。他明确提出:要进行全面整顿,首要的,是要抓住干部问题,也就是班子问题,关键是领导班子。要坚决地同派性作斗争。对那些有野心、争权夺利、耍阴谋诡计的派性分子,必须做坚决的斗争,该批的批,该调的调。在人的问题解决之后,就要恢复所有被破坏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。只有重建规章制度,才能确保生产的正常运行,否则,一切都是空谈。这就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选择的突破口。

国民经济积累下来的问题千头万绪,而在众多严重问题中,铁路问题尤为突出。因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,铁路运输担当着为国民经济各条战线输送所需物资的巨大任务,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,生产部署就全部被打乱。因此,邓小平认为,只有首先整顿铁路这一突出的薄弱环节,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。

目标确定了。邓小平说干就干。

1975 年 1 月 28 日,邓小平召见刚刚上任 10 天的铁道部部长

万里,向他了解铁路系统的生产情况,万里如实地向邓小平介绍了当时铁路系统面临的严峻形势。他说:铁路问题严重,情况复杂。突出的问题,一是运输生产下降,从1965年的日装车5万辆下降到目前的4万辆左右。二是事故惊人,1974年重大事故、大事故数量是1965年的9倍。三是车辆损坏严重,机车完好率已降至60%。四是一些铁路枢纽如郑州、徐州,堵塞尤为严重,影响大部分干线不能正常运行。听了万里的汇报,邓小平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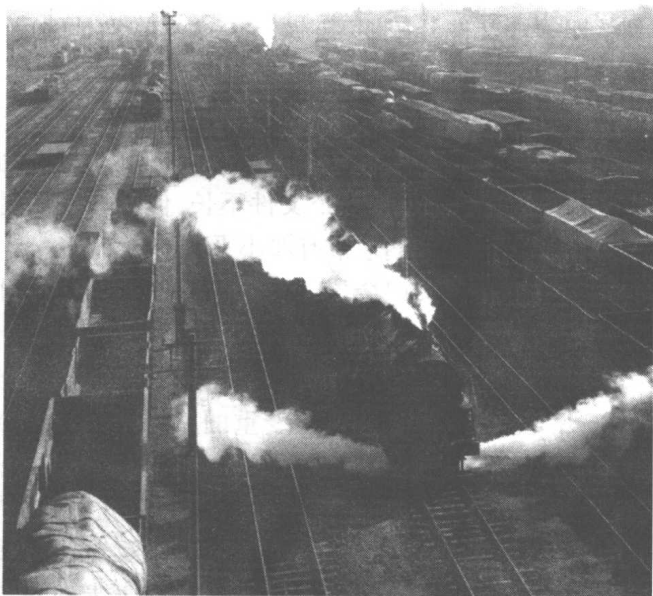
2月中旬,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,主持会议的邓小平一边往会议室走,一边愤慨地说,目前铁路问题太严重,不抓不行了。在会上讨论了这一问题后,邓小平拍板,立即对铁路问题进行整顿。

2月25日至3月8日,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,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解决铁路问题。3月5日,邓小平到会讲话。这一天,听说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并讲话,会议代表们早早便聚集在会议厅里,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,急切地盼望邓小平到会讲话。他们期待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能有起色,期待着工交部门来一个大的改观。

邓小平提前几分钟快步走进会议厅,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。这时,几个省、市的领导人走上前来,要与邓小平握手。只见邓小平迅速地举起左手在空中摇了摇,对大家说:今天不握手了,因为工业形势很不好,等你们工作搞上去再握手吧。邓小平的这句话,使大家深受震撼,都怔怔地望着他。只见邓小平走近几步,站住脚,用一种忧虑的目光望着大家,缓缓地说:一个国家,没有物质基础,形势不好啊!这句话,虽然声音不高,却使绝大多数人感到其中包含的分量,感到了形势的紧迫和责任的重大。

说完这句话,邓小平在沙发坐下,点燃一支烟,面对在场的工业战线的干部,明确指出:“现在有一个大局,全党要多讲。大局是什么?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

告,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:第一步到一九八〇年,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;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,也就是说,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,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、现代工业、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。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。这就是大局。”他停了停,又提高嗓门说:“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,不敢抓生产,说什么‘抓革命保险,抓生产危险’。这是大错特错的!”



经过整顿,全国铁路重要枢纽徐州车站运行秩序恢复正常。

他严肃地问道:“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?”接着,他从农业谈到工业,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,谈到铁路运输的情况。他声色俱厉地说:“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。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,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解决,

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。”他明确提出：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，要进行教育；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，利用派性浑水摸鱼，破坏社会主义秩序，破坏国家经济建设，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、升官发财的人，必须严肃处理。邓小平最后强调：“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。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，要有明确的政策。要从大局出发，解决问题不能拖。拖到哪一年呢？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？”

3月5日，邓小平授意万里主持起草、经邓小平审改的题为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》以中发〔1975〕9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县团级。文件开宗明义：铁路运输当前仍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，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，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。文件决定，对全国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，加强集中统一，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，整顿秩序，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。这个文件不长，但立场鲜明，措施强硬，关键问题写得明白，明显地带有邓小平的特点。

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9号文件，如同赋予铁道部的“尚方宝剑”。文件发出的第二天，万里便立即对全国铁路系统的整顿工作进行了具体的部署，并亲自率领工作组先后去徐州、太原、郑州、长沙等地，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。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，反复宣讲9号文件精神，发动群众批判派性，落实党的政策，号召广大铁路职工讲大局、讲党性、讲团结、讲纪律。在各级组织的配合下，调整领导班子，平反冤假错案，恢复健全规章制度。全国铁路系统的整顿工作搞得轰轰烈烈，卓有成效。到4月份，铁路运输严重堵塞的路局全部疏通，当时全国二十几个路局除个别局外，都超额完成了运输任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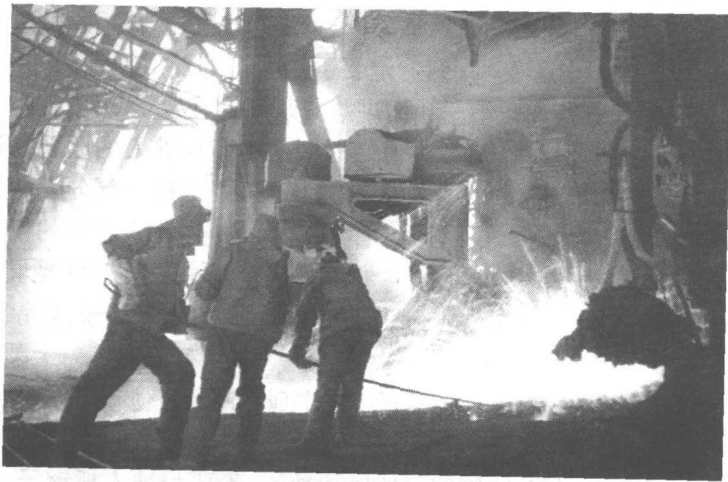
在邓小平亲自决策和领导下，在铁道部长万里等人的组织实施下，长期阻碍国民经济运行的铁路这一大难题，基本得到了解决。铁路问题的解决，不但解决了一个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障碍

碍,而且在全党、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全面整顿的一个鲜明而富有成效的形象。

铁路的整顿,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。

这年的4月,邓小平在听到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时说: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是破坏,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钢铁问题的时候了。”

于是,5月8日到29日,中央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。中央把17个省、市、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,11个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召集到北京,决心下大力气进行整顿,解决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。在这次会议上,首先由铁道部长万里介绍铁路整顿的经验。叶剑英、李先念、谷牧等在会上讲话。



按照邓小平“把钢铁生产搞上去”的要求,首都钢铁公司工人奋战在高炉前。

29日,邓小平在会上作了《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》的讲话。在这个讲话中,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“以三项指示为纲”的口号。他说:毛主席最近的三项重要指示,即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、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、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,是

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总纲。只要按照中央批示的方针、要求去做,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是完全有希望的。紧接着,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:当前,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。第一,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。钢铁生产搞不好,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,个别领导班子的软、懒、散。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,就是怕,不敢摸老虎屁股,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。领导班子问题,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。领导班子是作战指挥部,指挥部不强,作战就没有力量。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、二不懒、三不散,说了话大家都能听,都能指挥得动,都能领导起来。第二,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。对于派性,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,就是要坚决反对。对坚持闹派性的人,该调的就调,该批的就批,该斗的就斗,不能慢吞吞的,总是等待。对于派性,还要号召群众,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。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对派性的斗争。第三,必须认真落实政策。我们讲落实政策,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,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。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、技术骨干、老劳模,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。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,摆到适当的位置上。第四,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。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,不严就建立不起来。过去有些规章制度比较繁琐,应该改革。

在这次座谈会上,邓小平先后三次到会讲话。他一再强调,钢铁工业要上去,必须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,并鼓励各级领导要敢于抓生产,不要怕个人被打倒。他风趣地说:不要怕被人抓辫子,我这个人就像维吾尔族的姑娘,辫子多,一抓一大把,不要怕。整顿出了问题,我负责。

这次会后,中央调整了冶金部的领导班子,发出了题为《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》的中央第13号文件,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。

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整顿,钢铁生产形势即开始好转。6 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,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。到 6 月底,冶金工业整顿初见成效。

这一年的夏天,整顿如火如荼。邓小平因势利导,又把整顿引向了“文革”的重灾区科技教育领域。

当时,由于“四人帮”的严重破坏,许多科研机构长期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。为此,邓小平提出,必须尽快把科技工作搞上去,必须对科技教育领域进行整顿。

自 5 月起,教育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、邓小平的支持下,按照他们的多次讲话精神,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。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、讲师会议,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,针对林彪、江青一伙对教育事业的破坏,重新提出教育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,要重新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恢复名誉,要重新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教育系统的各项工作。周荣鑫的这些整顿措施,受到深受“文革”其害的教育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。整顿教育工作,像一股暖人的春风,吹遍了在“文革”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教育界。

5 月下旬,邓小平针对七机部派性斗争严重的问题,严肃指出:这不要说是社会主义,就连起码的爱国主义也没有,七机部的问题要限期解决。

6 月 30 日,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。张爱萍率工作组进驻七机部,使这个当时有名的“老大难”单位恢复了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。

7 月,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、要加强领导的报告,并根据邓小平的提议,派胡耀邦、李昌去科学院领导整顿工作。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成员时,邓小平说: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,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“敢”字当头的领导班子。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,坚决向派性做斗争,发展社会主

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。他指示工作组,到科学院,一是要了解情况,向国务院进行汇报。二是要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。三是要向中央提出一个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。他自己则提出,要当科技界的后勤部长。与此同时,邓小平还特别关心一些著名科学家落实政策和用非所学的问题,并亲自过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。在他的关心下,黄昆、杨乐等一批著名科学家落实了政策,并在各自的工作和专业岗位上做出了贡献。



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医院。

从7月到9月,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,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的协助下,写出了《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》。《汇报提纲》针对当时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己力量,大部分科技人员心情苦闷,不敢钻研科学技术,以及否定专业科技队伍的作用等倾向,建议尽快落实政策,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。并大声疾呼: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。

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个《汇报提纲》的起草工作,他多次召开会议,讨论这份提纲,并亲自对《提纲》进行修改。

9月26日,在听取胡耀邦代表科学院作工作汇报时,邓小平多次插话,对《汇报提纲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他说:“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,要好好议一下。”“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,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。”他说:现在搞科研的很少,少数人秘密搞,像犯罪一样。不能把科技人员搞得灰溜溜的。不是把知识分子叫做“老九”吗?毛主席不是说,“老九”不能走,还是要嘛!科学技术是生产力,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。谈话中,邓小平提到了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。他说: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。对他应该爱护、赞扬。在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下,《汇报提纲》冲破“文革”中的禁区,鲜明地提出:“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。”

邓小平对于这个《汇报提纲》非常重视,认为它“不但能管科学院,而且对整个科技办、教育界和其它部门也适用。”因此,他想尽快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下发全国执行。

然而,邓小平没有想到,这个提纲在报呈毛泽东后,一直没能获得他的同意。《汇报提纲》最终也未能执行,甚至一度受到不公正对待。尽管如此,《汇报提纲》仍功不可没,它为今后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的全面整顿和改革,指明了方向,打下了基础。

文化领域自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,一直被“四人帮”视为他们的“领地”,被他们牢牢地控制着。在文化领域进行整顿,难度可想而知。

邓小平知难而进。7月9日,他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理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。他说:除百花齐放外,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。要防止僵化,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,是新八股,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,文学、艺术不是更活泼、更繁荣。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,国务院政研室开始整理文艺领域的问题,并将有关情况整理材料上报邓小平参阅。

与此同时,毛泽东对于文艺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有所觉察。7月初,他在同邓小平谈话时说:“样板戏太少,而且稍微有点错就

挨批，百花齐放都没有了。别人不能提意见，不好。”7月14日，毛泽东就调整文艺政策作出了书面谈话。他说：“党的文艺政策应调整一下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逐步扩大文艺节目。缺少诗歌，缺少小说，缺少散文，缺少文艺评论。对于作家，要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。”

根据毛泽东的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，邓小平抓住时机，在文艺界进行调查研究，通过同“四人帮”针锋相对的斗争，解禁了一批被禁演的电影和戏剧、恢复了一些杂志的出版发行。

7月18日，江青指责反映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电影《创业》“在政治上、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”，并且罗列了该片的十大罪状，下令停演。

《创业》的导演张天民上书邓小平，对江青和当时文化部核心小组对《创业》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见，建议上映这部影片。邓小平很快将张天民的信转给毛泽东。

毛泽东看过信后即作了批示：“此片无大错，建议通过发行。不要求全责备，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，太过分了，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。”

江青对毛泽东的批示十分不满。她私下散布谣言说：毛泽东同志没有看过《创业》，是“有人逼着主席批”。意指邓小平是“黑后台”。

但不管江青如何无理，在毛泽东、邓小平的支持下，《创业》最后得以公开上映，党的文艺政策开始进行调整。

电影《海霞》的命运也几经波折。这部影片于1975年初摄制完成后，周恩来、朱德、叶剑英等人先后审看并肯定了该片，建议上演。但在江青一伙授意下，文化部查封了该片的全部底片和样片，给该片扣上了“黑线回潮的代表作”。该片编导谢铁骊、钱江先后写信给毛泽东、周恩来，揭露江青等人的无理行径。7月29日，毛泽东在谢、钱二人的信上批示：“印发政治局全体同志。”第二天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，邓小平与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小礼